

此三桂之續也： 論「日本乞師」在清代小說之呈現*

曾世豪**

摘要

明、清鼎革，不僅是中國大陸之事，其餘波也曾傳至東瀛。過去學界針對南明「日本乞師」之研究，多側重於史料上的釐清，然而，此次秦廷之哭以失敗告終，令遺民扼腕不已，加之明之滅亡，實可追溯至嘉靖、萬曆兩次倭患，遂有小說家將之縮合的呈現。這些作品包括《水滸後傳》、《女仙外史》和《說唐演義全傳》，文本中模糊化賊兵（清廷視角）／義軍（反清視角）之分際，把乞師者轉為反派角色，也把原來屬於支援者的日本貶回殘暴不仁的倭寇。這種敘事策略既呼應了時人對其曾襲突東南沿海及朝鮮半島的記憶，也將「北虜」與「南倭」冶為一爐，讓「秦廷之哭」轉化成「清廷之哭」。最後，小說家透過飛雪／飛劍輕易擊敗野心勃勃的侵略者，維護心目中所追憶的華夷秩序。在想像筆法的作用之下，日本乞師的歷史在虛構文本當中，誠然演繹出截然迥異之姿態。

關鍵詞：日本乞師、《水滸後傳》、《女仙外史》、《說唐演義全傳》、倭寇

* 拙文初稿曾受高桂惠、楊明璋兩位指導教授點撥，並宣讀於「第十五屆澳大利亞中國研究協會雙年會『鑒古論今——中國古今價值觀』Chinese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15th Biennial Conference: CHINESE VALUES AND COUNTER-VALUES: PAST AND PRESENT」（雪梨：澳大利亞中國研究協會（CSAA）／麥考瑞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主辦，2017年7月10-12日），會中承蒙黃錦珠老師賜教，投稿期間兩位匿名審稿委員亦提供珍貴之意見，獲益良多，謹此一併申謝。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一、前言

中國與日本屬於一衣帶水的鄰邦，自古即來往密切。明朝時，來自日本的亡命之徒與中國、朝鮮、歐洲等地的海盜、探險家合流，形成所謂的「倭寇」，造成華南沿海莫大的損傷，¹ 日本也開始作為侵略者的形象被寫入「時事小說」² 中。以戚繼光（1528-1588）、胡宗憲（1512-1565）為核心的《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胡少保平倭記》等，可視為「補史」之「倭患書寫」作品，作者在其中也尚能以樸實的態度，區分倭寇陣營內中國籍盜魁，如王直（？-1559）、徐海（？-1556）等與日本人的不同。至萬曆年間，豐臣秀吉（1537-1598）發動朝鮮戰爭（Japanese invasions of Korea, 1592-1598），刺激了中國人重新認識「倭」的需求，而為了克服百姓目「倭」為「魍魎不可知之物」的恐懼，包括《皇明馭倭錄》、《備倭記》、《嘉靖倭亂備抄》、《虔臺倭纂》、《倭情考略》、《倭奴遺事》、《倭志》等情報書籍大量產生，³ 同時也催生了像〈斬蛟記〉這樣「表面是傳奇小說，骨子是時事小說」的神魔作品。⁴ 可以說，無論是情報或小說，「倭患」及其時事性質都引起了中國人持續的關注。

萬曆朝鮮戰爭雖隨豐臣秀吉的薨逝畫下休止符，但政權崩解的裂

¹ 詳參〔日〕田中健夫著，楊翰球譯，隋玉林校，《倭寇——海上歷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年），頁90-92。

² 根據陳大道的定義，「時事小說」指的是事件方止隨即出書，由同代人寫作同代事的成書方式，在萬曆年間漸成風尚，特色是成書迅速且不重文采，又常夾抄大量詔令、尺牘、邸報，結構鬆散，呈現「章回／筆記」合流情況的一批小說。陳大道，〈明末清初「時事小說」的特色〉，收入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中國語文學系主編，《小說戲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1990年），第3集，頁181-220。

³ 詳參吳大昕，《海商、海盜、倭——明代嘉靖大倭寇的形象》（南投：暨南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2年），頁90-100。

⁴ 王勇，《中國史のなかの日本像》（東京：財団法人農山漁村文化協會，2005年），頁224-229。全篇的日文引文，除特殊標註外，皆為筆者自行翻譯。

痕卻也在擁抱和平的同時悄悄浮現。在日本，豐臣秀吉的驟然離世，意味著其征服中國計畫的挫敗，僅留下了孤兒寡母的遺族和一班四分五裂的老臣，為德川家康（1543-1616）提供了茁壯的契機。⁵ 果然不到廿載後，在被稱為「大坂夏之陣」（1615）的戰役中，德川幕府澈底取代豐臣家族，成為日本的主宰。

豐臣秀吉個人政治豪賭的失敗，不只賠上了後嗣的命運，也把朱明的國祚拖下了水。在朝鮮戰火正熾的時刻，後來席卷中州的滿清皇朝奠基者：努爾哈赤（1559-1626），正崛起於塞外的白山黑水間，⁶ 明朝也因對付日本而窮盡財賦，無力籌措遼東軍費；每當滿州軍越過長城進攻一次，北京就會陷入戒嚴狀態，稅收與徵兵的壓力也重重落在人民肩上，糧草的短缺終於激起了叛變，最後導致明的滅亡。⁷ 而歷史就是如此巧合，當萬曆帝（1563-1620）成功阻止豐臣秀吉「一超直入大明國」⁸ 之雄圖後，努爾哈赤卻好像接棒一樣，將此洪業傳承下來，並在半世紀後（1644）開花結果。這個過程或稱為「明清鼎革」，或稱為「華夷變態」，顯示了東亞地區對此國變，究竟是中國內部王朝週期性的更名替姓，抑或是華夏亡於夷狄的文化消滅，兩種截然不同的詮解。⁹

趙園特別關注「之際」的犬牙交錯，其以為任一時代——即使正史所謂的「王綱解紐」、文人所說的「天崩地坼」，都有變與不變的糾

⁵ 張玉祥，《織豐政權と東アジア》（東京：六興出版，1989年），頁340-341。

⁶ 有關清朝開國及入主中原的過程，詳參〔美〕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 Jr.）著，陳蘇鎮、薄小瑩等譯，《洪業——清朝開國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

⁷ 〔日〕上田信著，高瑩瑩譯，《海與帝國：明清時代》（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283-284。

⁸ 〔日〕不著撰人，《續善隣國寶記》，收入〔日〕近藤瓶城編，《改定史籍集覽》（東京：近藤出版部，1924年），冊21，頁36。

⁹ 周頌倫，〈華夷變態三形態〉，《華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頁1。筆者按：「華夷變態」之名源自林春勝（1618-1680）、林信篤（1644-1732）父子透過「唐船風說書」（*Tosen Fusetsugaki*）所編寫的同名書籍（1732）。

結與纏繞，但在建構「想像」、塑造「印象」方面，通俗文化往往取極端對立，經了戲劇化的明代更像是兩極世界，而將諸多中介形態刪略了。¹⁰ 客觀來說，在明、清「之際」，由於天下豆剖瓜分，形成明朝、李闖、滿清三頭馬車之局勢：「滿笠紗巾，分庭對坐」；¹¹ 「命吏偽員，同城共治」，¹² 爾後又有南明山頭各立，孰「正」孰「叛」，的確難以一筆勾銷。職是，在「明清鼎革」與「華夷變態」的光譜之間，其實容納了相當多元的意識形態，各自鳴放，對某一事件的視角，極有可能隨著立場的不同，產生巨然的拆解與拼湊，這個特點在小說中更是顛撲不破的。

另外，世人習於以「齒輪」來解釋歷史的發展，正因人、事、時、地等要素，彼此之間並非孤立，而是環環相扣，有意或無意的涉足於其中，都可能吹皺一池春水。明代中、日的膠葛看似隨著朝鮮之役的落幕，且日本由德川幕府接掌後，進入鎖國狀態而告終，但實際上卻不完全是如此。後金的茁壯，可追溯自「壬辰倭亂」（1592）以來對明朝國力的消耗，而隨著清軍的鯨吞蠶食，已經接受甲申之變（1644）事實的部分孤忠義士們，仍試圖扶持著「南明」之帝胄，努力延續鴻緒，也急於尋求支援，甚至把念頭動到了昔日的仇讎身上，這正是「日本乞師」的緣由——明、清「之際」的這場動盪的震央雖在中國大陸，其餘波卻傳導到了東瀛。

本文即討論「日本乞師」在南明政壇的反應，以及此歷史事件如何被寫入清代的小說之中，尤其是帶有遺民情懷的兩部作品：《水滸後傳》及《女仙外史》，各自選擇重新演繹「賊寇／妖婦」的故事，扭轉「正／反」的政治位置，也使得「日本乞師」的本質受到顯著的

¹⁰ 趙園，《想像與敘述》（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頁145、149。

¹¹ 〔明〕余闖，〈掠餉〉，《莆變紀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3-4。

¹² 〔清〕李宏志，《述往》，收入〔明〕張永祺等撰，樂星輯校，《甲申史籍三種校本》（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3。按：此處標點經筆者調整。

轉化，「真實」與「虛構」因意識型態的擺蕩而產生耐人尋味的交錯。以下先由「日本乞師」的緣由及世人的觀感作為切入，漸次討論其在不同文本中的呈現。

二、「日本乞師」的顛末與隱憂

木宮泰彥（1887-1969）曾將派往日本乞師的行動進行條列式的整理，令人一目瞭然。從 1645 年唐王（隆武帝，1602-1664）麾下林高（?-?）赴日借兵三千，到 1686 年紹興人張斐（?-?）擁護明室後裔而至長崎，不同陣營的勢力（唐王、魯王、明鄭……）向日本要求援助的次數共計有十七次之多。¹³ 除了上述諸人外，對東亞儒學影響深遠的大儒：朱之瑜（號舜水，1600-1682），在流寓日本期間也曾有乞師之嘗試。¹⁴

學界對於「日本乞師」議題討論最為詳實的，當屬石原道博（1910-2010）《日本乞師の研究》，該書鉅細靡遺地對周鶴芝（?-?，隸屬唐王一系）、馮京第（?-1654，隸屬魯王一系）、鄭氏三代（鄭芝龍〔1604-1661〕、鄭成功〔1624-1662〕、鄭經〔1642-1681〕）等人日本乞師的顛末進行介紹，甚至還提到了中國同時向琉球、南海、羅馬等地請援的史事。而除了諸家都會提到的〈日本乞師記〉、〈海外慟哭記〉、《小腆紀年》、〈寬永小說〉、《華夷變態》等中、日文獻外，其還援引了像《出島蘭館日誌》這樣的荷蘭史料，證明在當時徘徊於東亞海域的歐洲人眼中，包括「一官」（Nicholas Iquan Gaspard）在內的中國帆船（junk）是怎樣前仆後繼地航向日本，就為了請求兵馬、

¹³ 〔日〕木宮泰彥著，胡錫年譯，《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頁 628-633。

¹⁴ 詳參徐興慶，〈朱舜水對東亞儒學發展定位的再詮釋〉，收入鄭吉雄編，《東亞視域中的近世儒學文獻與思想》（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頁 273-323。

銅錢、器械、盔甲等「反清復明」的支援。¹⁵

那麼值得追究的是，當時中（主要指南明）、日雙方怎樣看待這件事？這將影響了清代小說如何「想像」這段「記憶」。辻善之助（1877-1955）曾撰〈德川家光の中国侵略の雄圖〉一文，指出當時的幕府將軍德川家光（1604-1651）有趁隙侵略中國的計畫；甚至說到朝鮮之役的英雄：立花宗茂（1567-1643），因不甘於髀肉之歎，也想藉此之機，再次馳騁於亞洲大陸，並且在會議中留下了花押（Kaō）。¹⁶ 若此說成立，德川幕府懷抱著打開中國門戶的野心，則日本乞師可說是開門揖盜的行徑。

只不過，Ronald P. Toby 卻駁斥了這樣的觀點，指出花押的主人其實是宗茂的養子忠茂（1612-1675），而辻善之助之所以會有此誤判，乃至於用「雄圖」來歌頌之，是因為其行文之際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戰（World War I, 1914）爆發，日本意欲染指山東半島，讓這位學者錯以「現代」來解讀「過去」，產生一種想像的投射。¹⁷ 石原道博也以為，德川家光並無此想法，甚至對乞師之要求表現冷淡，原因在於當時日本正面臨著禁教、浪人、內亂、地震、火災、飢荒等內憂，幕府正決心鎖國，怎麼可能賭上自身的國運，去跟新興的清勢力拮抗？更何況紛沓而至的乞師者，各自擁立著不同的南明遺王，對借兵的目的與要求沒有通盤的計畫，組織渙散，又如何獲得日本的慷慨援

¹⁵ 〔日〕石原道博，〈日本乞師の研究〉（東京：富山房，1945年），頁1-258。「一官」是西方人對鄭芝龍的稱呼。筆者按：《日本乞師の研究》一書尚無中文譯本，而日本學界對「日本乞師」有較詳細介紹，且已翻譯成中文的著作，詳參〔日〕增田涉著，由其民、周啟乾譯，〈西學東漸與中國事情〉（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128-146。

¹⁶ 原作於大正三年（1914），後改名收入專書出版，見〔日〕辻善之助，〈德川家光の支那侵略の雄圖と國姓爺〉，《增訂海外交通史話》（東京：内外書籍，1936年），頁640-659。

¹⁷ 〔美〕ロナルド・トビ（Ronald P. Toby），〈「明末清初日本乞師」に関する立花文書〉，《日本歴史》498号（東京：吉川弘文館，1989年），頁94-100。

助呢？¹⁸

從以上大致可知，日本潛伏著侵略中國之「雄圖」，只是後人想像出來的神話，以當時的政治實力來說也無能為力；但儘管日本最後未派出正規軍隊，卻不代表對明之變國無動於衷。比方說，戮力於反清的「國姓爺」鄭成功，因擁有一半的日本血統，引起「母」國的戚戚之情，其誕生地的平戶有碑文親暱地稱之「惟我鄭兒」，¹⁹ 而日本民間亦作有《国性爺合戦》(*Kokusen'ya Kassen*) 這樣的「人形淨瑠璃」戲劇作品，對其與武士道 (*Bushido*) 輝映的「忠義」倫理，普遍性地予以稱頌。²⁰ 因此，儘管幕府回絕了鄭成功的乞師要求，但在其陣中仍出現了戰力不俗的「鐵人」(朱碧彪文的日本鐵鎧) 與「倭銃隊」，可視為檯面下的支持。²¹

另一方面，作為韃靼的「清」攻陷明朝，也不免引來了幕府的警戒，因為昔日同為韃靼的「元」寇曾襲擊日本，這次是否會舊事重演，是明之滅亡所帶給東瀛的衝擊。²² 因應這股衝擊，早在 1629 年滿清尚未入關前，日本就有計畫向朝鮮借道平遼，防微杜漸。石原道博曾注意到這方面的朝鮮史料：²³ 當時有位杭州人王相良 (?-?) 向「關白」(實際上是幕府將軍德川家光) 進言，籲請其道經朝鮮，合兵進討「山戎」(後金)，關白信其言，卻引來了朝鮮的緊張：

日本與我國自前修好，秀吉無故興兵，肆行賊虐，脅以假道，此實得罪於天下者也。天理孔昭，剿絕其命。先關白蕩平凶逆，

¹⁸ [日] 石原道博，《日本乞師の研究》，頁 120-123。

¹⁹ [日] 石原道博，《日本乞師の研究》，頁 56。

²⁰ [日] 增田涉著，由其民、周啟乾譯，《西學東漸與中國事情》，頁 164-165。

²¹ [日] 石原道博，《日本乞師の研究》，頁 57-60；[日] 木宮泰彥著，胡錫年譯，《日中文化交流史》，頁 633。

²² [日] 增田涉著，由其民、周啟乾譯，《西學東漸與中國事情》，頁 132。

²³ [日] 石原道博，《朝鮮側よりみた明末の日本乞師について》，《朝鮮學報》第 4 輯 (奈良：朝鮮學會，1953 年)，頁 117-129。

復與我國交好，已閱三世。不料，今者復襲秀吉之餘謀，諛稱由我境復開貢路。此何故也？²⁴

又云：

丁卯歲，狂胡暫擾西鄙，未幾悉皆平定。彼旋請成，遂許通好。即今疆域晏然，無狗吠之警，則不至煩貴國之憂也。若曰為皇朝擊胡平遼云，則其言似矣，但此蕞爾小醜，皇朝自當討滅。且自古未聞有涉滄海之險，越人之國數千里，而與人鬪者也。皇朝猝聞此言，必致疑駭，非惟弊邦不敢以此上聞，貴國亦不當發於口也。²⁵

朝鮮之所以拒絕日本的要求，是因為回溯到豐臣秀吉的侵略，畢竟這時距離壬辰倭亂之終結亦不過卅年，難免令東國警戒。事實上，同樣的疑慮也橫亙在南明將士的面前。前文雖然提到了南明多次向日本乞師，可並不表示廷議中就全盤支持這樣的計畫，當時也有些異音的浮現：

其冬，遣人至撒斯瑪曰：「中國喪亂，願假一旅以助軍！」將軍慨然許之，期以明年四月發兵三萬，一切軍資、戰艦、器械自備。其國之餘財，足以供大兵中華數年之用。……鶴芝大喜，益以珠璣、玩好為賂；遣參將林籥舞將命。而斌卿止之曰：「監國命余尚書煌來言：『此三桂之續也；且不見世宗之倭患

²⁴ 〔日〕末松保和編纂，《仁祖實錄》（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62年），卷20，頁526。筆者按：此處的「先關白」係指建立江戶幕府的德川家康。按：此處引用字已改為正體字。

²⁵ 〔日〕末松保和編纂，《宣祖實錄》（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60年），卷20，頁530。按：此處引用字已改為正體字。

乎？」鶴芝怒而入閩。日本待鶴芝不至，其意漸衰。²⁶

這裡透露出來的訊息包括兩種：首先，乞師者與日本的關係，被聯想成吳三桂（1612-1678）與滿清的勾結，頗有瓜田李下的嫌疑，且史載周鶴芝與撒斯瑪（薩摩，Satsuma）王（?-?）有父子之親，²⁷ 豈非如「兒皇帝」石敬瑭（892-942）之於契丹可汗？其次，乞師的對象：日本，也不免讓人回憶起「嘉靖大倭寇」對東南沿海的蹂躪，甚至萬曆朝鮮戰役對京城所帶來的威脅。²⁸ 此外，過去「嘉靖大倭寇」時，已有外省「客兵」攪亂沿海地區的問題；²⁹ 「朝鮮之役」一度催生的「借兵暹羅」的計畫，也因「夷心難測」而受到諫止。³⁰ 正所謂殷鑑不遠，「日本乞師」所潛藏的危險性不能不考慮進去。³¹

²⁶ [清]全祖望，〈年譜（一）〉，見[明]張煌言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張蒼水詩文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頁236。又《南天痕》的記載是：「將發，斌卿忌其功，止之曰：世宗朝倭患之中於南土者幾十年，至今父老猶畏其名；今乃欲引賊入門耶？」這段話更清楚地道出民間對倭患的記憶猶新。[清]凌雪，〈周鶴芝傳〉，《南天痕》（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卷24，頁413。

²⁷ 「嘗往來日本，以善射名；與撒斯瑪王結為父子。」[清]全祖望，〈年譜（一）〉，頁236。

²⁸ 為此周鶴芝曾小心翼翼地區分「倭寇」與「日本」的不同：「前亂我邊者，海盜耳。今我乞師，於王何害？」[清]凌雪，〈周鶴芝傳〉，《南天痕》，卷24，頁414。但是二者之混淆卻仍然無可避免。

²⁹ 顏美娟認為，以「嘉靖大倭寇」為背景的小說《戚南塘平倭全傳》，其書之宗旨即在於反映「海禁→倭患→客兵→海禁」的惡性循環，並揭發「客兵宜罷不宜調」的呼籲。顏美娟，〈一部值得注意的小說——《戚南塘平倭全傳》〉，收入'93中國古代小說國際研討會學術委員會編，《'93中國古代小說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開明出版社，1996年），頁264-283。

³⁰ 詳參鄭潔西，〈16世紀末日本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戰爭與整個亞洲世界的聯動——以萬曆二十年明朝「借兵暹羅」征討日本議案為例〉，《海洋史研究》第3輯（2012年5月），頁124-140。

³¹ 有關南明對「日本乞師」究竟是「窮極思計」還是「引狼入室」的辯論，詳參閻瑞雪，〈黃宗羲日本乞師事考：兼論南明士大夫對中日關係的看法〉，《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頁117-118。而也在大約「日本乞師」進行的同時（1646），明朝前臣楊廷麟（?-1646）、曾應遴（1601-1647）等人也試圖籠絡贛州流寇抗清，結果反而貽害地方：「賜閩寇號隆武將軍。閩寇自是益恣，所過興國、零、寧各邑淫殺，百姓慘怨。」

劉曉東還指出其中存在著一個道德矛盾：「滿清」自為夷狄，但日本又何嘗不為「夷狄」？韃靼叛服無常，日本又何嘗恭順有加？借夷狄之兵以驅夷狄，恢復的又果是華夏道統嗎？乞師者雖然經常自比為申包胥（？-？），但當時秦、楚歲歲構兵（影射明朝與日本的齟齬），其秦庭之哭所行的「三拜九頓首」，也被目為有逾倫常的「亡國」之禮。³²

綜合以上種種，日本乞師在明、清「之際」的複雜氛圍中，形成眾聲喧嘩的議題。客觀來說，寄望於乞師者的，視日本為復國悲願的曙光；但反對乞師者，則把「乞師者／吳三桂」、「日本／滿清／倭寇」放在同一個層面來理解，憂心種下「前門拒虎，後門進狼」的苦果。至於德川幕府是否確實醞釀著吞併中國的「雄圖」（如辻善之助所解讀的一般）？則恐怕是力有未逮，不作此想，至多是在後金入關前試探性地詢問借道朝鮮的可能，但也被質疑為「今者復襲秀吉之餘謀」而遭拒。且就算日本曾對鄭成功等人表達同情，卻僅止於提供錢糧、盔甲、火器一類的支援——職是，最終的「事實」就是官方並未派出正規軍介入明、清間的交戰。

然而，歷史的「事實」屬於現實上的情況，時人對日本乞師的態度，放在虛構的小說文本中，又有截然不同的呈現，尤其對其按兵不動的原因，總存在著曖昧不明的推敲空間，而以往交手的經驗便成為蠱測彼者的借鑑。因此若說辻善之助是以「現在」解讀「過去」，清代小說家則是用「過去」來映射著「現在」。趙園提到，明亡前、後，士人常自擬於宋，推測華夏文明及其負載者的命運，豐富的歷史素材

〔清〕李文獻修，易學實纂，《續修贛州府志》卷 18，此處轉引自黃志繁，《「賊」「民」之間：12-18 世紀贛南地域社會》（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年），頁 185。可見南明根本無力整飭所謂「義兵」的紀律，只不過陷入病急亂投醫的混亂之中罷了。

³² 劉曉東，〈南明士人「日本乞師」敘事中的「倭寇」記憶〉，《歷史研究》2010 年第 5 期，頁 161-163。

不是斷裂的，而成為明末「當代史」的構成部分，士大夫的想像空間中遊蕩著諸種歷史的幽靈。³³ 此外，古代中國人好說盛衰，衰變本來就是一個積累的過程，因此明代之由盛到衰，遠因甚至可以追至燕王（1360-1424）「靖難」，彷彿一代朝代的命運，尤其最終的劫運，似乎當王朝歷史的大幕揭開的一刻就開始了。³⁴

上述觀點乍看似乎有點不可思議，然而本文接下來要討論的遺民文本，包括《水滸後傳》、《女仙外史》在內，卻都呼應了這種看法。這兩部作品中，不約而同地出現了「日本乞師」的情節，不過都是站在主角的對立面，蘊涵了遺民對明代「倭患」造成國家衰微的反省，以及乞師不成，坐看明朝成為涸轍枯魚的控訴，遂將之寫成不軌的侵略者，作為一種宣洩。明、清易代雖說是中、日關係的承平時期的，但小說中仍出現了雙方激烈的交鋒，頗值得關注，箇中原因就在於明遺民對日本乞師的曲折情愫，以下分別進行介紹之。

三、日本國興兵構釁：《水滸後傳》與「勇悍」關白

《水滸後傳》³⁵ 為《水滸傳》（全本）之續書，作者陳忱（自署古宋遺民，1615-1670），初刊於康熙三年（1664），自原作梁山好漢「十去其八」的殘局中另起爐灶，重新聚集散落四方之剩餘星曜，在宋、金「中原陸沉」之際，泛海另尋勝境（暹羅），演繹一齣「混江龍（李俊）開國傳」。這部作品其實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如魯迅曾點出該書的遺民文學屬性：

³³ 趙園，《想像與敘述》，頁 221-222。

³⁴ 趙園，《想像與敘述》，頁 23。

³⁵ 本論文使用版本為〔清〕陳忱，《水滸後傳》（臺北：桂冠圖書，1992年），實際上此版本為清人蔡慕（字元放，?-?）改訂版本。筆者按：蔡元放評改本主要在於卷數、回目的更動，還有文字的刪減、調換、修改，加強了藝術性並擴大了民間影響力。詳參唐海宏，〈《水滸後傳》的兩大版本系統及其差異分析〉，《長江師範學院學報》2014年第4期，頁 118-122。

古宋遺民者，本書卷首《論略》云「不知何許人，以時考之，當去施羅未遠，或與之同時，不相為下，亦未可知」。然實乃陳忱之托名；忱字遐心，浙江烏程人，生平著作並佚，惟此書存，為明末遺民（《兩浙輶軒錄》補遺一《光緒嘉興府志》五十三），故雖遊戲之作，亦見避地之意矣。³⁶

駱水玉更言之鑿鑿地指出，《水滸後傳》寄寓了「永曆在東寧」的一絲希望，同時檢視鄭氏王朝是否保持「扶餘」之誠心。小說之付梓與鄭經之遷臺，同在 1664 年；而陳忱之借「宋」寫「明」，並將視角轉移至金鰲島，是由於南宋亡於厓門海戰（1279），南明則扎根於「海外乾坤」，彼此的命運可相互參照。³⁷ 另一方面，高桂惠擴大了作品中所反映的時代問題，認為水滸餘黨由土寇轉向海寇，可以上溯至嘉靖中葉以後東南沿海的居民與倭寇結合，並且孕育而生的「巢外風氣」。在小說中用更為寬廣的「海洋中國」的概念，複製「中國材質」（如中國節慶、詩詞文藝、儒俠道思想）於他鄉，與異族統治的「大陸中國」分庭抗禮，使得殖民思想得以在祖國與新天地中自我定位，祛除亡國的焦慮。³⁸ 而從精神層面來說，王振星認為走向大海意味著「理想——激憤——消解」的心理軌跡，水滸故事與大海意象的碰撞、交融，其中既有失落、沮喪，也有難以遏止的激情與追求，揭櫫了遺民內心主觀情感的掀騰。³⁹

不論從「當下」、「過去」的處境省思，抑或心理寄託的層面切入；

³⁶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104。

³⁷ 駱水玉，〈《水滸後傳》——舊明遺民陳忱的海外乾坤〉，《漢學研究》第19卷第1期（2001年6月），頁219-248。筆者按：鄭成功雖在1662年即移往臺灣，但那時鄭經仍駐守於廈門，是在父親亡故後才來臺，並將東都改為東寧。

³⁸ 高桂惠，《追蹤躡跡：中國小說的文化闡釋》（臺北：大安出版社，2006），頁27-61。

³⁹ 王振星，〈走向大海：水滸故事文學敘事的審美考察〉，《濟寧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頁36-40。

自真實地理的座標，或者心靈地圖的憧憬來看，在《水滸後傳》的文本世界中，海洋都是個萬分重要的場域，也載負了由古至今的眾多歷史問題。在金甌已缺，半屬完顏的現實局勢中，小說家試圖透過同樣殘餘的梁山好漢重振旗鼓，並立足於「詩禮化」的海外中國，與漢家之族裔（暹羅國主為馬援〔14 B.C.-49 A.D.〕之後、國母原為東京人氏）結成婚姻，在「不全」中努力賡續國祚，乃是對世變之妥協，也可與明遺民任俠、逃禪、結社等轉換方式產生共鳴。⁴⁰ 可以想見，構築於「不全」之上的妥協，是如何地如履薄冰，任何不穩定的因素介入都可能使之裂為齏粉，因之方興未艾的「日本乞師」行動，其結局究竟是福是禍，便成為作者的隱藏焦慮。《水滸後傳》曾寫倭丁貪婪，奮不顧身地襲擊載著梁山好漢的海鯨船：

到得天明，掌針的水手叫道：「不好了！這裏是日本國薩摩州。那岸上的倭丁專要劫掠客商，快些收舵！」誰知落在套裏，一時掉不出。那薩摩州倭丁見有大船落套，忙放三五百隻小船，盡執長刀撓鉤來劫貨物。扈成叫各船上頭領，都拿器械立在船頭，隄防廝殺。那倭丁的小船團團裏攏來，東張西望，思量上船。眾頭領盡把長鎗抵開。當不得小船多，七手八腳，不顧性命的鑽來。近船的雖是砍翻幾個，只是不肯退。……倭丁放一個小船攏來。那船上一人搖手道：「不可放火藥！」說道：「小的是通事。這薩摩州上都是窮倭，不過要討些賞賜。」李應道：「我們是征東大元帥的兵，要到金鰲島去。他們要求賞賜，不過一二船到來，怎用這許多？」通事道：「倭丁貪婪無厭，只

⁴⁰ 詳參高桂惠，《追蹤躡跡：中國小說的文化闡釋》，頁 59。此外，梁山好漢融入暹羅國的過程，也反映了「流民」（編戶齊民）與「土著」（化外之民）的競爭關係，這些亦民亦盜的叛亂者身分模糊，最後透過軍事征勦與王朝教化的結果，將會重新回歸正統治下。詳參黃志繁，《「賊」「民」之間：12-18 世紀贛南地域社會》，頁 267-274。職是，陳忱選擇以梁山「賊寇」作為主體，可說別有用心，而李俊也是在接受宋朝冊封後，才確立其合法地位。

要東西，不要性命，不怕殺，只怕打。若見客商貨物，竟搶了去。因爺們有準備，便只是討賞。」⁴¹

正所謂「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在這段情節之中，倭丁既貧窮又貪婪（貪詐好殺），不難想見這當是作者日本觀的投射。後文提到倭王更是「鷲戾不仁，黷貨無厭」⁴²的一號人物，常搶奪鄰邦高麗國，又羨暹羅繁富，懷有併吞之志，在在寫出日本素行不良，又包藏禍心的卑劣品格——這很明顯是影射明朝倭患，尤其是豐臣秀吉的野心。也因此當共濤、薩頭陀、革氏兄弟等一黨奸佞發動竊國的叛亂，卻被水滸英雄殺敗，只好請求倭王伸出援手時，馬上獲得了劍及履及的回饋。事見第三十五回「日本國興兵構釁」之情節：

那倭王坐在錦裯繡褥之上，足有五尺多高；四個倭女，姿容絕美，侍立左右；下面有一百倭丁，各執長刀，擺在兩旁。革鵬跳舞而拜。倭王問道：「你是那裏人？借兵何用？」革鵬道：「本是占城人，有五千兵佔住黃茅島。那暹羅國王馬賽真死後，丞相共濤嗣位，有宋朝征東大元帥李俊興兵來奪。國師薩頭陀差人來救，我同兄弟革鵬、革鵬領兵去救援。不料兄弟革鵬兵敗被殺，只得收兵回國，又被宋兵圍困，兵微將寡，恐守不住，薩國師差我到貴國來借兵，若滅了李俊，共濤情願比做藩臣，年年進貢，歲歲來朝。」倭王道：「我海外之邦，豈容中國人佔奪！既是這般說，我差關白領一萬兵隨你去，必要滅那李俊。」原來「關白」是日本大將的官號，取每事都要關白他的意思，不是姓名。那關白身長八尺，勇力過人，領倭王令旨，點薩摩、大隅二州之兵，共是一萬，戰船三百號，祭旗開

⁴¹ [清]陳忱，《水滸後傳》第三十回，頁304。

⁴² [清]陳忱，《水滸後傳》第三十五回，頁352。

洋。⁴³

查閱「日本乞師」之相關文獻，不難發現中國方面多以道德作為感召，希望日本能行義舉、發義兵，⁴⁴ 但這恐怕不足以成為動人的籌碼。在《水滸後傳》的描寫中，鋪陳的則是赤裸裸的交易；倭王以巍峨的姿態睥睨革鵬，說明了雙方的關係本就不對等，而要真正說服其出兵，也只能以犧牲國格的方式：「情願比做藩臣，年年進貢，歲歲來朝」（後來發現共濤已死，革鵬甚至拍板「暹羅自然歸併日本」），⁴⁵ 才能獲得豺狼的慷慨。這段描寫對現實充滿了反諷，畢竟豚蹄穰田只是空中樓閣的妄想，動之以情是行不通的。⁴⁶ 另外，此時登場的「關白」，顯然受到朝鮮之役的啟迪，只不過是從主謀變成從犯，並且親自開赴前線，展現出智、勇兼備的一面：

那關白使黑鬼鑿穿了海船，逼他上岸，水寨中只留鐵羅漢、屠

⁴³ 〔清〕陳忱，《水滸後傳》第三十五回，頁 352-353。

⁴⁴ 《華夷變態·崔芝請援兵》：「……恭惟日本大國，人皆尚義，人皆有勇，人皆訓練弓刃，人皆慣習舟楫，地隣佛國，王識天時，……聊效七日之哭，乞借三千之師，伏祈迅鼓雄威，刻徵健部，舳艫渡江，載仁風之披拂，旌旗映日，展義氣之宜揚，……報德酬勳，應從厚往，共推日國斷鰲補石之手，而中華君臣永締日國山河帶礪之盟，……」〔日〕林春勝、〔日〕林信篤編，〔日〕浦廉一解說，《華夷變態》（東京：東方書店，1981 年），卷 1，頁 11-12。按：此處標點經筆者調整。又《朱舜水寄安東省書》：「日本兵至大明，自然全勝，所謂義兵也。今日解百姓於倒懸，《兵志》曰：『兵義者王』數郡之後，望風歸附，不待盡矣。……一發兵，則虜必殲，功必成。日本之名必與天壤同敵，且載入中國之史矣。」徐興慶編注，《朱舜水集補遺》（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 年），卷 1，頁 54。此外，鄭成功亦曾有書信於長崎譯官曰：「成功生于貴國，故深慕貴國。今艱難之時，貴國憐我，假數萬兵，感義無限矣！」〔日〕川口長孺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鄭氏紀事》（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 年），卷上，頁 25。按：此處標點經筆者調整。

⁴⁵ 〔清〕陳忱，《水滸後傳》第三十五回，頁 354。

⁴⁶ 蔡弄之批點可提供佐證：「寫吞併暹羅，原是倭王久有此意，革鵬之來，正合機殼，故不費辭說，就許興兵。不然，倭王豈肯為他人之事，遽然勞師動眾耶？」國立政治大學古典小說研究中心主編，《蔡元放批點水滸後傳》（臺北：天一出版社，1985 年），卷 9，頁 33b。此處「他人之事」，點破了明朝變國對日本來說，充其量不過是他家瓦上之霜，無緊要關係。

崆、佘漏天領三島的兵看守，自同革鵬來圍城。……眾將各分汛地，將砲石、擋木堆起，一近城來，即便打下。那關白果然足智多謀，叫倭丁張了生牛皮，如幔帳的罩着裏面，將城挖掘，又造起雲梯飛樓爬上來。諸將日夜提防，應接不暇。……關白見有兵出城，把倭丁擺開，喚革鵬帶五百兵丁轉到東門乘機攻入。革鵬領命去了。大將軍領眾將出城，關白騎一隻白象，盤頭結髮，手執鐵骨朵，衝殺過來。呼延鈺提雙鞭接住，戰未三合，那倭丁舞着兩把長刀，跳舞而來，一時抵敵不住。大將軍望後便走，兵士亂竄，自相踐踏，傷了好些。⁴⁷

從關白的座騎、裝束、武器來看，皆帶有西南民族的特徵，下文更提到日本怕冷不怕熱，從來沒有寒衣，似乎也從未見過雪，都與日本的地理特徵不合，可見空間上的錯位。書中寫出的關白既狡猾又驍勇，讓梁山好漢大吃苦頭，這時只好祭出超自然的力量凌駕其上，⁴⁸ 為戰局的緊繃進行突破：

朱武與李俊等道：「關白勇悍，倭兵尚多，若久留城下，倘拼命來攻，當他不起。我聞倭丁極怕寒冷，一見了冰雪，如蟄蟲一般，動也不敢動。只是這沿海地方，那得冰雪？」公孫勝道：「待貧道祈一天雪來，凍死了他。只怕罪孽！」李俊道：「倭兵犯順，自取滅亡。若被他所破，不唯我等永無歸路，那暹羅數百萬生靈，都要受他荼毒。請先生便作起法來。」……那倭丁只怕冷，不怕熱，從來沒有寒衣。況是秋天到的，那裏當得這般寒冷？縮做一團，凍死無數在雪裏。關白想道：「敢是上

⁴⁷ 〔清〕陳忱，《水滸後傳》第三十五回，頁355-356。

⁴⁸ 猶如高桂惠所述，這個奇怪的國家想像在牽涉現實的武力與權力部分，不得不借諸神道妖術與祖國封誥，達到一種實者虛寫，虛者實寫的弔詭手法。高桂惠，《追蹤躡跡：中國小說的文化闡釋》，頁59。

天發怒，不容我在這裏！下這什麼東西？再過兩日，盡要凍死了！」遂收兵回去。在雪中一步一跌的，到南門，見戰船多被燒壞，還剩有幾十個在海面上。叫黑鬼下海，推到岸邊來。那黑鬼可以在水裏過得幾日的，只因雪天，海水都成薄冰，泅了去，如刀削肉一般，又凍死了好些。推得船來，關白同倭兵下船。誰知公孫勝先已料得，又祭起風來，一時間白浪掀天，海水沸騰，滿船是水，寸步也行不得，只好守在岸邊。三晝夜風定後，海水都成厚冰。關白和倭兵都結在冰裏，如水晶人一般，直僵僵凍死了。⁴⁹

關白與倭兵枕藉而死，慘遭全殲，只倭刀、關白的帽子（八寶嵌成的）、戰船、白象成為戰利品，倭王也才打消了染指暹羅的念頭。在《水滸後傳》所撰成的時代，「日本乞師」被視為中興復國的一劑猛藥，但作為明遺民的陳忱卻刻意將之反寫，讓亂臣惡黨與野心勃勃的倭王沆瀣一氣，並以時、空交錯的方式，使「關白」再蒞於眼前，有意喚醒時人對明代倭患的記憶，敲響發聾振聵的警鐘，其實已可看出其不樂觀的態度了——對小說家來說，這無異是飲鴆止渴的下策，畢竟「請神容易送神難」，如果南明沒有人雲龍一流呼風喚雪的術士，哪有本領剷除心懷不軌的倭兵呢？書中續寫宋高宗對倭王的防範，事見「牡蠣灘忠臣救駕」以後：

高宗道：「……還有一事：那日本國倭王貪悖無厭，時常侵犯浙、閩、淮、揚等界，卿與高麗國王李侯，可共加防遏，毋使跳梁。」⁵⁰

在靖康之變（1127）前、後，高麗只有睿宗（1079-1122）名「王侯」，

⁴⁹ 〔清〕陳忱，《水滸後傳》第三十五回，頁357-358。

⁵⁰ 〔清〕陳忱，《水滸後傳》第三十七回，頁377。

沒有李侯，作者當是以明朝的李氏朝鮮來移花接木，除了顯示以「明」寫「宋」的錯綜意趣之外，也是為了串起高麗王與暹羅王同為李姓的宗族情誼。爾後於小說煞尾，高麗王李侯親訪暹羅，亦敘說被強鄰欺侮的困擾，獲得了李俊的支持：

高麗王道：「小邦始號朝鮮，頗以禮義自持，為大宋東蕃。倭王自恃其強，常來侵犯。前承使臣頂令，約共隄防。奈弟齒衰邁，又且善病，已傳位小兒，恐他愚弱不能料理。宗兄威行海外，文武忠良，成救駕之功，建不世之業，欲結為兄弟，為唇齒之邦，想蒙宗兄不棄。」國主道：「前日三島倡亂，革鵬借兵，倭王遣關白將萬人來攻，已見隻輪不返。若二國結連，如左右手，倭國擊東，則弟從西救，擊西則兄必從東應，自然不敢再肆荼毒。若得俯納，為弟叨荷實多！」⁵¹

在此，李侯與李俊結為兄弟，高麗與暹羅亦成手足之邦，既有實質的同盟意義，且雙方的關係是真誠而平等的，諷刺了乞師者或與日本大名結為父子（如周鶴芝）、或「以甥禮自待」（如鄭成功），⁵² 這種卑躬屈膝的自我矮化，儘管獲得私恩小惠，但也國格淪喪。另外，這段故事也間接重現了明朝在壬辰倭亂中支援朝鮮，擊退日軍的歷史記憶，足見《水滸後傳》不單是透過「感舊／敘舊」來召喚梁山好漢的英勇事蹟，也對過往的錦繡山河進行追索。然而，在第三十八回與武

⁵¹ [清]陳忱，《水滸後傳》第四十回，頁405。

⁵² 《臺灣外紀》載順治八年（1651）：「澄世曰：『方今糧餉充足，鉛銅廣多，莫如日本，故日本每垂涎中國。前者翁太夫人國王既認為女，則其意厚。與之通好，彼必從。藩主何不修書，竟以甥禮自待，國王必大喜，且借彼地彼糧以濟吾用。……。』成功是之。令兄泰造大艦，洪旭佐之（旭字念蓋，同安人）。以甥禮遣使通好日本。」[清]江日昇，《臺灣外紀》（臺北：文化圖書，1983年），卷6，頁105。筆者按：翁太夫人（1601-1647）即是鄭成功之母：田川マツ，因母親改嫁翁姓華裔鐵匠，所以也被稱為翁氏（從繼父姓），今臺南延平郡王祠有翁太妃神位，即供奉鄭成功之母。

松／中原訣別的情節中，讀者不難發現這位打虎英雄再度登場時，已成了要靠行童替其搔癢的殘疾人士（獨臂「廢人」），「行者」武松不僅是書中唯一一位沒有再度入夥的好漢，自己也承認如今看到猛虎也只能「避了他」。當小說家在這位「英雄／可憐蟲」的身分轉換上大做文章，寄寓的無疑是沉鬱的亡國之痛；⁵³ 那麼回過頭來看李俊率兵將擊退關白的描寫，還有彷彿無懈可擊的戰略聯盟，也隱約地暗示一切的榮光終化為泡影。

四、十萬倭夷遭殺劫：《女仙外史》與秦庭（清廷）之哭

《水滸後傳》撰成的時間，雖說南明大勢已去，但靠著延平王在臺灣的經營，到底孤懸一線，因此還能將中原陸沉寄託於南宋的半壁江山，李俊則傳位與登，李登生子，亦傳數世，鏤刻出相對磊落的傾向。而在小說中，「北虜」、「南倭」尚且各自為政，不至於聯手。可是爾後情勢丕變，隨著三藩之亂（1673-1681）的平定、施琅攻臺（1683）的落幕，「華夷變態」成為不可復返的事實，⁵⁴ 也撚斷明遺民內心的最後一絲希望。

在這之後問世的另一部遺民作品：《女仙外史》（1711，鈞璜軒刻本，作者是呂熊〔？-？〕），⁵⁵ 表面上敷演靖難之變（1399）與唐賽

⁵³ 曾世豪，〈戲擬與感舊：論《水滸後傳》對《水滸傳》之再現模式〉，《東華漢學》第23期（2016年6月），頁156-157。

⁵⁴ 林叟發題〈華夷變態序〉有云：「傾間（聞）吳鄭檄各省，有恢復之舉。其勝敗不可知焉。若夫有為夷變於華之態。則縱異方域，不亦快乎。」〔日〕林春勝、〔日〕林信篤編，〔日〕浦廉一解說，《華夷變態》，卷1，頁1。「吳鄭」即吳三桂及鄭經。由引文可見不僅明遺民，就是受中華文化薰陶的東亞鄰國也都很關心中國能否從「華夷變態」恢復到「夷變於華之態」的狀態，但歷史的結果則是「華夷變態」終究成為不可逆的事實。

⁵⁵ 有關呂熊的遺民身分，包括其家鄉崑山所經歷的清兵屠戮、父親「以國變故，命熊業醫，毋就試」之遺命等，詳參章培恒，〈前言〉，見〔清〕呂熊著，劉遠遊、黃蓓薇標點，《女仙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目錄前頁3。

兒民變（1420）之故事，讓唐賽兒（嫦娥轉世，又稱月君）成為擁護建文帝而對抗燕王（天狼星轉世）的義軍領袖，⁵⁶ 兩人由天上宿怨，轉入人間相爭，實際上影射的則是朱明（南朝）與滿清（北朝）之間的對壘，並且為忠臣／烈媛泄冤憤於當時，播芳馨於後世。然而，隨著書中「迎建文，建文不可復，一劍下榆木」、⁵⁷「然自古以來，北可並南，南不能兼北」⁵⁸ 等感慨不絕如縷地浮現，書中的結尾亦無可避免地走向悲觀且既知的基調。儘管如此，這部別開生面的作品，仍然利用小說的虛構特權，在固定的敘事框架中，恣肆揮灑著豐富的想像力，對明朝外族交侵的困境提出情緒的宣洩，並且透過時、空錯位的方式，編織出雖然稍嫌偏頗，卻也不失率直的幻夢囈語。⁵⁹

《女仙外史》用了許多隱喻話語，彼此纏繞，不僅把明、清「之際」上溯至靖難時期，北方政權對江南地區的血腥屠戮，更將同屬火德的朱明依附於炎劉，滿清則因諧音的緣故，與暴秦冶為一爐，全書遂巧妙地把「建文／南／明／漢」與「永樂／北／清／秦」劃分成時而式微、時而傾軋的兩種競爭關係，流露出遺民胸中難以言傳的悲憤情懷。⁶⁰ 這樣的挪引與分判，也使得原本被擬作「秦庭之哭」的「日

⁵⁶ 關於唐賽兒從「妖婦」到「女仙」形象的嬗變，詳參巫仁恕，〈「妖婦」乎？「女仙」乎？：論唐賽兒在明清時期的形象轉變〉，收入呂芳上主編，《無聲之聲（I）：近代中國的婦女與國家（1600-1950）》（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頁1-37。

⁵⁷ 〔清〕呂熊著，劉遠遊、黃蓓薇標點，《女仙外史》第四十回，頁475。

⁵⁸ 〔清〕呂熊著，劉遠遊、黃蓓薇標點，《女仙外史》第八十一回，頁866-867。

⁵⁹ 詳參曾世豪，〈華、夷再變：論《女仙外史》中的秩序觀想像〉，《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28期（2014年6月），頁195-222。

⁶⁰ 《女仙外史》的作者呂熊曾將自我形象投射入書中人物呂律（唐賽兒之軍師），並作〈詠魯仲連〉、〈詠留侯〉、〈詠商山四皓〉、〈詠武侯〉等詩，其中以「秦邦居高風，因之削帝名」、「一擊無秦帝，千秋不可踪」、「炎鼎遂以安，奇功若無有」、「二表已經誅篡賊，兩朝共許接炎劉」等典故暗示明、清「鼎革」的抗秦定漢的寄託；論者曾指出，以「秦」代「清」是明遺民的慣例。程國賦、楊劍兵，〈呂熊及其《女仙外史》新論〉，《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頁140。又小說屢屢提到「北伐」，也與諸葛亮（181-234）／南明（三藩、延平）的事蹟相互輝映。此外，關於明朝的火德問題，詳參陳學霖，

本乞師」，產生耐人尋味的詮釋空間，原本不失善意的敦睦行動，亦因與明季的倭患彼此聯繫，始料未及地往令人憎惡的方向去傾倒。

小說刻劃「日本乞師」的，除了第二十一回提到燕王即位，大殺忠良，「時兵部尚書齊泰、同監察御史林英，徵兵於廣德州，冀圖興復，而太常卿黃子澄走至吳門，欲潛往日本國借兵，均被捕獲」，⁶¹ 是呼應史實，也算是暗合南明乞師的行動之外，⁶² 主要是集中在第四十三回「衛指揮海外通書」與第四十四回「十萬倭夷遭殺劫」之情節。是時都指揮衛青因戰敗渡海，來到日本，捎來一份密奏，宣稱自己借到倭兵十萬來對付唐賽兒集團，接著寫燕王的反應：

燕王覽畢，假意作色道：「朕堂堂中朝天子，何難殄滅小丑，乃向外夷小邦乞師哉？」兵部尚書劉季箎善迎意旨，奏道：「此在衛青欲借兵立功，以贖失守之罪；在夷王則遠懾天威，亦欲效命以圖通於好於中朝。豈天子去向彼乞師？今萬里遠來，似宜允之，以示柔懷之義。」燕王見季箎說話，迎合得恰好，就道：「卿言亦屬有理，可令光祿備筵管待，候朕裁奪。」⁶³

在該文中，作者用的是「乞師」二字，說明了其靈感正來自於「日本乞師」的時事，不過本來歷史的事實是乞師者為南明（建文）將士，希望求得生力軍驅逐滿清（永樂），現在卻在虛構文本中變成燕藩向日本借兵，而且顯然對此感到有些困窘，《女仙外史》可說是將其顛

〈明朝「國號」的緣起及「火德」問題〉，《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010年第50期，頁71-103。

⁶¹ 〔清〕呂熊著，劉遠遊、黃蓓薇標點，《女仙外史》第二十一回，頁233。

⁶² 《明史·黃子澄傳》：「帝復召子澄，未至而京城陷。欲與善航海乞兵。善不可，乃就嘉興楊任謀舉事，為人告，俱被執。」〔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141，頁4016。儘管《明史》提到黃子澄曾有「航海乞兵」之謀，卻未明言是到哪一個國家乞兵，而《女仙外史》當是受到時事之啟發，遂逕自說其是到日本借兵。

⁶³ 〔清〕呂熊著，劉遠遊、黃蓓薇標點，《女仙外史》第四十三回，頁481-482。

倒錯置，以致涇渭不分的地步——這與全書呈現的對少數民族統治中國的仇恨意識有關，基於「夷夏之防」的思想，呂熊對所有的外邦異族都是反感的，⁶⁴也難免將「北虜」與「南倭」縮合。小說寫衛青博取日本同情的方式，同樣帶著尖銳的譏刺：

且說當日衛青在登州下了海船，不敢回到京闕。想起日本國自胡惟庸連結以後，常有朵頤中國之意，或可以利誘之。……衛青心下躊躇：今若求他，必須卑躬屈節，豈不壞了天朝體統？日後不但無功，而反有罪。一時急智，就效學那楚國申包胥痛哭秦庭之故事。一見了大將軍，也不行禮，將袍袖掩了面目，放聲痛哭。……且言：「……久慕大將軍英風播於南海，特來投命，上以報國殲寇，下以全身完節。區區苦衷，幸唯垂鑒。」大將軍道：「我知道爾要借兵。但中朝與本國，因有胡惟庸一事，向缺通好；今爾私自來求，縱為他出盡了力，也不見本國好處。……。」衛青道：「……至大將軍說到中朝不與通好，正宜發兵相助，方為豪傑之舉。如秦、楚本系仇敵，而包胥請救，出自寸心，並無國書君命；秦王慨然興兵，敗吳存楚，以此雄霸天下。況本國與貴邦，尚無秦、楚之怨乎？……。」立起身來，即欲觸柱。大將軍亟止之，說：「汝之忠誠，已可概見，我當發兵助汝。勿行短見，致令海南各國笑我逼死窮途人也。但有句話：我兵越海攻城，頗亦不易；倘朝中不知爾之苦衷，加罪於爾，并怪及小邦擅侵邊界，則徒然糜費糧儲，損折兵將，為之奈何？」衛青道：「此易事也！我與將軍盟定：凡賊寇所占土地，歸還本朝；其子女玉帛，唯君所取。某當修一密表，煩重大將軍遣一信使，奏知我王。然後發兵進戰，末將

⁶⁴ 趙世瑜，〈《女仙外史》初探〉，《漢中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2期，頁113。

親為嚮導，自無後議。」⁶⁵

衛青與大將軍的對話，乍看頗有些狐兔之悲的意味，但到後面真正定案的仍然是利益的交換；換句話說，所謂乞師不過是一樁出售國格的買賣，後來倭酋索性挑明地說，出兵的目標只是女人、財寶，無關乎正義。更有甚者，白云「漢有衛青，塞上騰驤；我名相同，海外飛揚」⁶⁶的永樂朝武官：衛青（?-?），因其名姓與西漢大將軍衛青（?-106 B.C.）相同，而可被比作「漢臣」，竟搖尾於「秦庭」（清廷），針砭的正是貳臣身分（夏而變於夷）⁶⁷的桀犬跖狗，因此身死大海，不得歸返故里。此外，衛青在歷史上原是剿平唐賽兒民變的功臣之一，後又被指派備倭，⁶⁸但《女仙外史》全然反寫其事蹟，不僅將之塑造成敗軍之將，且自願擔任倭酋之嚮導，最後溺死海上，淪為波臣，⁶⁹「日本乞師」也由「秦庭之哭」變成「清廷之哭」，支援者化作求援者，滿清反而轉變為對南明勢力一籌莫展的陣營，只得求援於海外，喪權辱國。

面對燕藩、日本可恥的聯盟，月君則是派出了六位英雌，率幾位女仙所組成的娘子軍迎敵，旋即颳起一陣腥風血雨：

⁶⁵ [清]呂熊著，劉遠遊、黃蓓薇標點，《女仙外史》第四十四回，頁492-493。

⁶⁶ [清]呂熊著，劉遠遊、黃蓓薇標點，《女仙外史》第四十四回，頁494。

⁶⁷ 《女仙外史》曾用重筆批評「夏而變於夷」之人，並借盧敏政之口云：「可謂洞見萬里。蠻人雖蠻，良心未泯。獨有此輩，以夏而變於夷，廉恥道盡，乃猶嘵嘵弄舌耶！」[清]呂熊著，劉遠遊、黃蓓薇標點，《女仙外史》第五十四回，頁613。

⁶⁸ 《明史·衛青傳》：「衛青，字明德，松江華亭人。以薊州百戶降成祖，積功至都指揮僉事，莅中都留守司事，改山東備倭。永樂十八年二月，浦臺妖婦林三妻唐賽兒作亂。……其黨董彥昇等攻下莒、即墨，圍安丘。……而賊攻安丘益急，知縣張旗、丞馬搗死戰，賊不能下，合莒、即墨衆萬餘人以攻。青方屯海上，聞之，帥千騎晝夜馳至城下。再戰，大敗之，城中亦鼓譟出，殺賊二千，生擒四千餘，悉斬之。時城中旦夕不能支，青救稍遲，城必陷。……青還備倭海上。」[清]張廷玉等，《明史》，卷175，頁4655-4656。

⁶⁹ 詳參曾世豪，〈華、夷再變：論《女仙外史》中的秩序觀想像〉，頁216-217。

只見袖中飛出一股青炁，約十丈多長，盤旋天矯，勢若游龍，竟卷到眾倭奴身畔，攬腰一截，霎時千百人都做兩段，血噴如雨。倭奴急欲退走，無奈擠在狹道之中，後面的尚自湧將上來，一時進退不得，都伏在地下。那青炁就從地一刮，都去了小半片身子。得命的轉身亂跑，那道青炁忽從頂上過去，當前攬住一錠，個個血肉糜爛，與支解腰斬無異。零零星星，屍首堆積滿路，共有數千。……只說聶隱娘與公孫大娘是劍仙的劍，但能長短變化，其質剛而不柔，拋向空中，迅疾飛躍，一斬亦可數百人。至范飛娘，但隨著公孫大娘行事，所殺倭奴，或洞胸貫腦，或剝落肢體，或截斷腰腹，亦共有數千人。⁷⁰

兩柄神劍又躍入眾倭群內，如穿梭相似，紛紛貫透而死。有四散逃竄的，又被素英白炁丸截住，周圍電光一轉，都齊腰分作兩段，血肉狼藉，斑斑點點，染得滿地芳草，無異湘江的斑竹，然後轉向西來。見大路上卻又有倭奴死屍，重重疊疊，如岡如丘，熱血浸溢，皆成溝渠。……是役也，倭奴十萬，遭颶風溺死者，八千五百有奇；被登州府及各州縣火炮打死者，一萬二千有零；其有老弱看守船隻，得回本國者，不及數百；餘皆死於六位佳人之手。⁷¹

以六位劍仙為核心，竟能掃蕩十萬倭奴，可知對作者來說，其理想中的秩序觀，應是中國能夠輕易擊退來犯的外族；且倭奴個個死狀淒慘，這背後的民族情緒不難理解。不過，《女仙外史》為了突顯建文「尊崇正大」、永樂「貶黜蘊藉」的正、閏區別，⁷² 刻意在第五十四

⁷⁰ [清]呂熊著，劉遠遊、黃蓓薇標點，《女仙外史》第四十四回，頁495-496。

⁷¹ [清]呂熊著，劉遠遊、黃蓓薇標點，《女仙外史》第四十四回，頁498-499。

⁷² 徐少宰（秉義，1633-1711）在第二十八回的評說提到：「唐月君於南郊設立誓壇，昭告太祖，出落得建文年號，何其尊崇正大。然永樂年號則不可泯，乃在後回塞外俺答口內說出，何其貶黜蘊藉。從來史鑑分別正閏，在大書細注之間。《外史》與正史不同，所以另出手眼，

回安排「航海梯山八蠻競貢」的情節，讓大西洋、小西洋、暹羅、日本、紅毛、琉球、夫餘、交趾之使者浩浩蕩蕩地集結於濟南帝闕之下，對比燕王宮前的門可羅雀，說明儘管小說創作者對於華夏以外的異邦並無好感，但畢竟獲得各國「奉表納貢，凜遵正朔」⁷³的承認，才有作為天下共主的資格。⁷⁴ 饒富意味的是，這個盛況的促成者，正是被唐賽兒痛擊的日本：

當日衛青借的十萬倭兵，都是精銳。其逃回去的，不勾五六百名，哭訴與大將軍說：「被他兩、三個女人在半空中飛下劍來，一斬千萬人，頓時殺絕了。只恐還要飛到這裡，把我合國的人都殺了哩。」那大將軍却有個主意，就用著張儀連衡六國之智，將來歸命納款，反要取中國的歡心。因此遍遣人在海洋諸島，把中國有女皇帝，怎樣的奇異神通，到處傳播。西洋人聞說是活神仙下降，那個不願來瞻仰？已經約定，正在會齊的時候，恰值中國差使出海，日本國王與大將軍不勝之喜，直到舟邊迎接，欽敬異常；筵宴之禮，不啻主臣。於是天使同了各國使官，擇日起程。每國各差正使一名，副使兩名。入貢禮物，極其豐盛。⁷⁵

日本經歷大敗，乃甘心臣服於月君，中國也從此恢復「海水不揚波」

觀者須察之。」〔清〕呂熊著，劉遠遊、黃蓓薇標點，《女仙外史》第二十八回，頁 325。

⁷³ 〔清〕呂熊著，劉遠遊、黃蓓薇標點，《女仙外史》第四十八回，頁 538。

⁷⁴ 《女仙外史》不只一次提到，建文是夷、夏所承認的共主，而月君討逆的行動，也獲得四海之承認。如第七十三回提到由劉通所統治的獨立政權（漢），願意向唐賽兒朝貢：「建文皇帝是四海一統之主，奉了他年號，不過在表章上寫個臣字，我們本國原稱皇帝，就像海外諸國進表一個樣子。至於納貢，只須土儀，自然也有金幣酬我，算個交接禮文，不折本的。」又第九十三回：「時海東南諸國高麗、占城、日本、琉球都來進貢。……月君令將申罪討檄懸示闕之下，俾夷夏之人萬目共睹。」〔清〕呂熊著，劉遠遊、黃蓓薇標點，《女仙外史》第七十三、九十三回，頁 793、986。

⁷⁵ 〔清〕呂熊著，劉遠遊、黃蓓薇標點，《女仙外史》第五十四回，頁 606。

的寧靜，這當是呂熊對前明盛世的美化與懷想。作為一位遺民，難免易服的現實既然無法回復，小說家也只能肥遯入虛構王國的桃花源之中，澈底擺脫南明「日本乞師」的窩囊，刻意把「秦庭之哭」寫成「清廷之哭」，貶低「北虜」與「南倭」的狼狽為奸。《女仙外史》透過從「十萬倭夷遭殺劫」到「航海梯山八蠻競貢」到轉變，恣意編排了一場撥亂反正的戲碼。

綜觀《水滸後傳》與《女仙外史》兩部出現「倭患書寫」的遺民文本，皆是以「日本乞師」作為導火線，除了對於時事有一定的查照與省思之外，還具備以下共通之特色。首先，小說家選擇處於道德邊緣的「賊寇」、「妖婦」作為王綱解紐之際的主人翁，著眼點正在於以「反反」突顯「反」之不義。《水滸後傳》固然將是宋、金戰爭中，北方淪陷區的盜賊、潰兵（軍賊、游寇）和自衛組織（忠義保聚）重新放回其所處的時代夾縫之中，寫出「賊」、「民」之間的曖昧與游移；⁷⁶ 而《女仙外史》的情況，猶如劉瓊云提到的，既然永樂的帝位乃由反而致，有失正統；則唐賽兒反燕王之反，不可謂反。否則，唐賽兒為妖婦，永樂亦是反賊；若永樂可以自稱正統，則唐賽兒亦可為正。呂熊反寫正史上的叛亂妖婦為正義仙師，直暴露永樂帝位取得手段上，難以自解的不法。⁷⁷

小說係以虛構文體對抗正統話語，遂能以悖反的方式顛覆既定的現實，或者鬆動道德的壁壘，據以檢視歷史的陳與新，而「日本乞師」也成為被「反寫」的對象。本來南明才是有求於日本的一方，但是陳忱與呂熊卻基於國格的維護，或對於此行動「飲鳩止渴」的不安，不約而同地把「效學那楚國申包胥痛哭秦庭之故事」的乞師者，轉換成

⁷⁶ 關於梁山好漢所影射的「忠義人」形象，詳參孫述宇，《水滸傳的來歷、心態與藝術》（臺北：時報文化出版，1981年），頁47-140。

⁷⁷ 劉瓊云，〈人、天、魔——《女仙外史》中的歷史缺憾與「她」界想像〉，《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8期（2011年3月），頁63。

反派的奸臣或燕藩；前者可視為「內憂」與「外患」的聯袂，後者則因對滿清的影射，變作是「北虜」與「南倭」的攜手，藉此批判其「不正」。

另外，小說還以談笑用兵的方式，轉瞬就由超自然的力量（飛雪與飛劍）捻熄了烽火，幾乎是全殲意圖不軌的倭丁／倭奴，流露出神魔化的樂觀想像，正像趙園所說的，明末清初是一個「物怪人妖」同時並起的時代：

那個時期，人們的想像力似乎異常活躍而生動，留在文字中的，多神怪不經之談，種種「物怪人妖」，像是一時並出。不經之談、訛傳，也參與造成了這一時期歷史的面貌——固然往往加劇混亂，有時卻也支撐信念，以心理的撫慰以至自欺，幫助生當其時的人們度過艱難的歲月。⁷⁸

《水滸後傳》與《女仙外史》的戰爭結局顯然帶有殘酷的色彩，這或許可以在評點者皆提到的《三國演義》「火燒藤甲兵」之故事中尋求線索。先是在《蔡元放批點水滸後傳》有云：

利于水者，不利于火，諸葛武侯之燒藤甲軍是也。能耐熱者，必不能耐冷，朱武之策倭兵是也，便寫出軍師見識甚好。⁷⁹

蔡稟之說尚且不帶有恩怨情仇的意味，僅僅只是小說掌故的引譬連類，但儘管如此，諸葛亮面對南蠻「七擒七縱」的「攻心」戰術，最終走向破產，仍舊為「日本乞師」一事的適切與否，帶來一些耐人尋味的反諷。一如浦安迪（Andrew H. Plaks）所提到的，在《三國演義》第一百一十八回，蜀漢政權瀕臨崩潰前夕曾苦苦哀求孟獲部落前來救

⁷⁸ 趙園，《想像與敘述》，頁 21。

⁷⁹ 國立政治大學古典小說研究中心主編，《蔡元放批點水滸後傳》，卷 9，頁 34b。按：此處引文用字已改為正體字。

援，結果這一希望完全落了空——⁸⁰ 蜀臣譙周對這件事的看法是：「南蠻久反之人，平昔無惠；今若投之，必遭大禍。」⁸¹ 可以留意的是，明朝經營西南的經驗，也同樣苦於猥雜在「叛／服」之間擺蕩的恐懼，這一點對於明遺民來說，或許提供了聯想的空間。⁸²

中國與日本在明朝同樣經歷長期的齟齬（久反之人），並在朝鮮之役激化到了頂點；那麼，「日本乞師」到底會是如秦、楚一般盡釋前嫌，抑或帶來「此三桂之續也」的慘痛代價呢？從火燒藤甲兵之後「蜀漢／南蠻」的貌合神離，也許就能嗅到小說家的焦慮。取而代之的，是逸民在《女仙外史》「荊門州一火燒佞賊」情節之評說：

或云洞蠻之罪，何至於慘燒若是？昔武侯之燒藤甲軍也，自嘆減卻籌算。彼作《外史》者，更當何如？噫，不知明季佞兵毒害我生靈，倭酋擾亂我邊陲，遭其劫殺者不可數計。作者蓋痛惡其以夷猾夏，故以一劍而馘倭奴十萬，一火而滅三種蠻酋，討行天恭，焉得減算？武侯之語，出自好生之心耳。⁸³

按此詮解，則呂熊在寫「日本乞師」時不僅注視於當下，更從終明之世的倭患總結經驗，得出日本乃是「以夷猾夏」的價值判斷，所以小

⁸⁰ [美] 浦安迪著，沈亨壽譯，《明代小說四大奇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局，2006年），頁430。

⁸¹ [明] 羅貫中，《三國演義》（臺北：桂冠圖書，1994年），頁1039。

⁸² 詳參胡曉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年），頁221-250。胡曉真在「前有奢香後良玉」的討論中，雖然提到明代以降對奢香（1358-1396）及秦良玉（1574-1648）服膺於明王朝的肯定，但是也提到曾「從丞相亮破孟獲有功」的羅羅族剽悍善鬥、兵力強盛，令中央芒刺在後。此外，奢香雖然向洪武帝（1328-1398）輸誠，壓抑了貴州一帶的民族矛盾，與秦良玉同為報國之女士司，但其後代在《芝龕記》中卻被寫成叛亂者。

⁸³ [清] 呂熊著，劉遠遊、黃蓓薇標點，《女仙外史》第七十八回，頁846。此外，關於明朝的「佞兵」編制，詳參李小文，《國家制度與地方傳統——明清時期桂西的基層行政制度與社會治理》（廈門：廈門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學所博士論文，2006年），頁17-20、88-96。

說之殺戮，不過是「討行天恭」，既是天經地義，也無為之懺悔的必要——這當是以「過去」凝視「現在」，所以產生的極端描寫。職是，一旦民族情緒壓倒了理性思考，《水滸後傳》與《女仙外史》自然也就以殲滅犯境倭丁／倭奴的方式，為「奸佞」、「北虜」、「南倭」之「日本乞師」的同流合汙，畫下充滿暴戾的句點。

五、餘論

在本文結束以前，筆者補充另一部同樣涉及「日本乞師」的小說文本：《說唐演義全傳》。⁸⁴ 與《水滸後傳》、《女仙外史》的遺民色調略有出入，這部作品較為晚出（約雍、乾年間，書首有乾隆元歲如蓮居士序），業已滌淨了明、清「之際」的時代塵埃，也看不出沉鬱的敘事基調，但仍有一些有趣的特點，值得介紹。事見第五十四回至第五十六回，是時「秦王」李世民正與「洛陽王」王世充、「夏明王」竇建德、「宋義王」孟海公、「白御王」高談聖、「南陽王」朱燦等五王作戰，唐兵趨於上風，讓五王陣營開始尋求外援，於是軍師鐵冠道人薦舉一人：

鐵冠道人道：「主公放心，要退唐兵也不難。臣有一個朋友，姓鰲名魚，乃琉球國王的四太子，今在日本國招為附馬，其人有萬夫莫敵之勇，勝比唐家李元霸，不讓先朝楚霸王。主公可不惜珍寶，聘請得此人來，何愁唐兵不破？」⁸⁵

⁸⁴ 本論文使用版本為〔清〕鴛湖漁叟校訂，《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說唐演義全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該書乃據上海古籍出版社藏觀文書屋刊本，屬於十卷六十八回本。筆者按：《說唐演義全傳》亦有陳汝衡（1900-1989）改寫的六十六回本，雖然文字較為優美、通順並合乎邏輯，但畢竟屬於刪節本（刪去神怪及不合理處），因此在此還是以保留全文的版本為主。

⁸⁵ 〔清〕鴛湖漁叟校訂，《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說唐演義全傳》第五十四回，頁965。

鰲魚登場於次回：「面如傅粉，唇若塗硃，一頭黃髮挽就三個丫髻，當頭戴頂金冠，多是珠玉穿就。却生一双怪眼，鷹嘴鼻，招風耳，耳掛一串金環。身上穿着長袖錦綵的倭衣，脚下穿一双高底魚皮番頭戰靴。身長一丈四尺，使一柄長柄的金瓜槌，有萬夫不當之勇」。⁸⁶ 從其名姓、裝束、面貌來看，都刻意營造出與中華不同的「非常」格調，甚至帶有獸類化的蔑視，⁸⁷ 這一點與過去的文本並無太大不同，不過接下來小說續寫鰲魚與程咬金、秦瓊等人的交鋒，則用了大量的「倭語」，讓中、日（琉）之間的距離更加顯出：

咬金披掛上馬，到了營門，來到陣前。把那倭將一看，說道：「噯！原來是這樣一個，到像東嶽廟中的道人。手裡拿的金瓜槌，看來到有五十觔重。」便叫一聲：「噯！倭狗通個名來！」這鰲魚太子全然不懂。王九龍道：「他問你名字。」鰲魚道：「呢必呢必。」咬金不懂，說道：「不知他說些什麼，待我且罵他一頓，看他如何？噯！自古道：『倭子的鬚，蠻婆的毬！』你是開眼烏龜，不值半個低銅錢，我入你的倭娘！」鰲魚不懂。王九龍道：「永裡落花打呀却馬落。」鰲魚大怒，罵道：「呀吶殺瓜！」……舉斧就砍，太子把金瓜槌一架。咬金打了一個脚癢，說道：「好利害！把我的虎口動震開了！」……叔寶提鎗上馬，來到陣前，果見一員倭將，兩名通事甚是面善。那鰲魚太子問道：「古木牙打蘇？」叔寶不懂他的番語，便問兩個通事的：「他說些什麼話？」王九龍道：「他問你叫甚名字。將軍，我與你有些面善阿。」叔寶道：「我乃山東秦瓊。」王九龍道：「原來將軍就是秦恩公！阿呀！秦恩公，此人力大無窮，必須騙他回頭，方好挑他。」叔寶大喜，那鰲魚也問通事說道：

⁸⁶ 〔清〕鴛湖漁叟校訂，《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說唐演義全傳》第五十五回，頁988。

⁸⁷ 張哲俊，《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日本形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333。

「米多而牙人里？」他問的：「見得那將官說些什麼？」王九龍道：「他說：『殺殺哩殺殺哩哈哈牙却打。』是像說：那將官說道：『琉球國王死了，快些回去！』」那琉球太子却是大孝的孝子，聽見說國王死了，把頭一側，叔寶就當胸一鎗，番身跌下馬來。王九龍下馬，斬了首級。⁸⁸

鰲魚力能扛鼎，本是一員悍將，但因為語言不通，只能任由與秦瓊舊識的通事擺佈，最後喪於錯譯的詭計之下，既符合現實的邏輯，過程中更製造了閱讀上的懸念。而在今人陳汝衡潤色的版本當中，「古木牙打蘇」係作「木古牙打」（音似「向うは誰」，*mukōwadare*）；「米多而牙人里」則改成「南都由」（音似「何と云う」，*nanitoiu*），⁸⁹ 似乎刻意模仿了真正的日語之發音。無論原來的作者是否通曉外文，都可見小說很重視塑造海外敵人的陌生化形象，增添文本的趣味性。《說唐演義全傳》本就有很強的說唱藝術性質，向庶民娛樂的需求靠攏，⁹⁰ 在此加入王世充請援日本國附馬鰲魚四太子的情節（「日本乞師」的轉化），為單純逐鹿中原的隋、唐故事另掀波瀾，可以看出小說家旁徵博引的用心，其目的在於吸引讀者的矚目，這一點就和《水滸後傳》、《女仙外史》借古鑑今的寄寓，存在著本質上的分別。

本文所探索的，是明、清小說在「明清鼎革／華夷變態」的政權過渡之際，同時也是中、日緊張關係降到低點的承平時代，是怎樣將過往的倭患記憶與當前的「日本乞師」時事進行整合，藉此宣洩明遺

⁸⁸ 〔清〕鴛湖漁叟校訂，《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說唐演義全傳》第五十六回，頁 992-994。

⁸⁹ 〔清〕鴛湖漁叟校訂，《說唐演義》第五十五回（臺北：桂冠圖書，1992 年），頁 303。此部分之日文語譯，參考自薩蘇，〈《說唐》裡的外語〉，《西西河》網站，網址：<https://www.cchere.com/article/2552848>，檢索日期：2017 年 4 月 5 日。「向うは誰」意指「對面何人」、「何と云う」意指「他說什麼」。

⁹⁰ 詳參彭知輝，〈論《說唐全傳》的底本〉，《明清小說研究》1999 年第 3 期，頁 181-187。

民對於變國的沉痛心情。「日本乞師」本是南明乃至於明鄭為了賡續國祚，試圖尋求的一帖藥方；而德川幕府雖因內部政權的根基未穩，沒有慷慨派出兵馬，但基於同情與唇亡齒寒的利害關係，仍提供了器械、錢糧方面的幫助，如鄭成功麾下的「鐵人」、「倭銃隊」，因此不失為兩國友好的表現。只不過，在明代深受倭患蹂躪的朝鮮、中國方面，畢竟是殷鑑不遠，所以仍浮現了諸如「今者復襲秀吉之餘謀」、「此三桂之續也；且不見世宗之倭患乎」等等的警戒聲浪，視之為剝肉補瘡的拙計，這股不安的氛圍更滲透入清初小說之中，包括《水滸後傳》、《女仙外史》皆持這樣的立場。

另外，正因為日本始終未予以軍隊的支援，也使得文人騷客對其「企圖」與「考量」有了許多揣想的空間，活絡了虛構文本的天馬行空，且不約而同地以「過去」之經驗推敲「現在」的可能發展，對於變國的處境又追溯至宋、至國初，於是出現了時、空的重疊與纏繞，「日本乞師」亦提早於「靖康／靖難」之後登場。又且《水滸後傳》、《女仙外史》分別以「賊寇」、「妖婦」作為主角，反寫「正統」之「不正」，此顛倒手法讓「日本乞師」化身成「奸佞」、「燕藩」（滿清）所延請而來的「關白／倭丁／倭奴」，而非南明士大夫引頸期盼的「義兵」；後者尤其讓「北虜」、「南倭」結成令人憎惡的同盟，被比擬為申包胥的「秦庭之哭」，也成了「清廷之哭」，借兵的「漢臣」衛青則成了「貳臣」——只配葬身魚腹，不配踏上故國。

以上述為前提，明、清之際的複雜英雄譜系在受到二元化的劃分，歷史上的乞師者，其正義性冰消瓦解，成為道德上的罪人。占據邊緣位置的「賊寇」、「妖婦」試圖顛覆中央的新王朝統治者，在殘缺的海洋中國或大陸一隅艱辛地維持「遺民／移民」的生存空間，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在此一方天地之中，被賦予希望的「外援」，也隨時可能變成難以駕馭的「禍源」。就像清兵入關後的反客為主，「日本乞師」或成「此三桂之續也」，歷史經驗讓驚弓之鳥的小說家抱持著

懷疑的態度，雙方的合作在架空的文本之中，反而比現實更加難以實現。

爰此，對比明朝倭患的生靈塗炭，以及「日本乞師」所潛藏的威脅，小說家選擇以激烈的方式來對「以夷猾夏」的侵略者迎頭痛擊，召喚超自然的暴雪與飛劍，轉瞬即殲滅數以萬計的敵人，並被揄揚是「討行天恭」的表現，流露出特殊的民族情緒，當然其中多少帶有虛張聲勢的幻想成分。這些場景，也不禁讓人聯想到諸葛亮征討南蠻的戰役，乃是以「火燒藤甲兵」的策略畫下句點，看似換來南蠻的心悅誠服，但就在蜀漢即將步入滅亡的時刻，求助於彼的希望卻落了空。當評點者不約而同地提起「七擒七縱」的往事，或許在某種程度上，也為「日本乞師」的後果敲響了警鐘。

最後，還有一部晚出的作品也出現了反派向日本求援的情節，那就是《說唐演義全傳》，讓來自琉球的鰲魚四太子粉墨登場。然而，該書問世於雍、乾年間，距離鼎革業已遙遠，字裡行間洗刷了遺民的沉鬱，更多的是庶民娛樂的基調。歷史傷痕隨著時間消逝，終將成為創作者信手拈來的文化資源，「日本乞師」的嚴肅意味在此也受到拆解，變成嘻笑怒罵的熱鬧文章。

（責任校對：潘芊樺）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明〕余颺，《莆變紀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
- 〔明〕羅貫中，《三國演義》，臺北：桂冠圖書，1994年。
- 〔清〕江日昇，《臺灣外紀》，臺北：文化圖書，1983年。
- 〔清〕全祖望，〈年譜（一）〉，見〔明〕張煌言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張蒼水詩文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頁231-256。
- 〔清〕李宏志，《述往》，收入〔明〕張永祺等撰，樂星輯校，《甲申史籍三種校本》，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清〕呂熊著，劉遠遊、黃蓓薇標點，《女仙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 〔清〕凌雪，《南天痕》，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
- 〔清〕陳忱，《水滸後傳》，臺北：桂冠圖書，1992年。
- 〔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清〕鴛湖漁叟校訂，《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說唐演義全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 _____，《說唐演義》，臺北：桂冠圖書，1992年。
- 徐興慶編注，《朱舜水集補遺》，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年。
- 國立政治大學古典小說研究中心主編，《蔡元放批點水滸後傳》，臺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
- 〔日〕川口長孺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鄭氏紀事》，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年。
- 〔日〕不著撰人，《續善隣國寶記》，收入〔日〕近藤瓶城編，《改定史籍集覽》，東京：近藤出版部，1924年，冊21。
- 〔日〕末松保和編纂，《仁祖實錄》，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

1962年。

_____，《宣祖實錄》，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60年。

〔日〕林春勝、〔日〕林信篤編，〔日〕浦廉一解說，《華夷變態》，東京：東方書店，1981年。

二、近人論著

王振星，〈走向大海：水滸故事文學敘事的審美考察〉，《濟寧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頁36-40。

王勇，《中国史のなかの日本像》，東京：財団法人農山漁村文化協會，2005年。

李小文，《國家制度與地方傳統——明清時期桂西的基層行政制度與社會治理》，廈門：廈門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學所博士論文，2006年。

吳大昕，《海商、海盜、倭——明代嘉靖大倭寇的形象》，南投：暨南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2年。

巫仁恕，〈「妖婦」乎？「女仙」乎？：論唐賽兒在明清時期的形象轉變〉，收入呂芳上主編，《無聲之聲（I）：近代中國的婦女與國家（1600-1950）》，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頁1-37。

周頌倫，〈華夷變態三形態〉，《華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頁1-6。

胡曉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年。

孫述宇，《水滸傳的來歷、心態與藝術》，臺北：時報文化出版，1981年。

唐海宏，〈《水滸後傳》的兩大版本系統及其差異分析〉，《長江師範學院學報》2014年第4期，頁118-122。

- 高桂惠，《追蹤躡跡：中國小說的文化闡釋》，臺北：大安出版社，2006。
- 徐興慶，〈朱舜水對東亞儒學發展定位的再詮釋〉，收入鄭吉雄編，《東亞視域中的近世儒學文獻與思想》，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頁273-323。
- 陳大道，〈明末清初「時事小說」的特色〉，收入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中國語文學系主編，《小說戲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1990年，第3集，頁181-220。
- 陳學霖，〈明朝「國號」的緣起及「火德」問題〉，《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010年第50期，頁71-103。
- 張玉祥，《織豊政權と東アジア》，東京：六興出版，1989年。
- 張哲俊，《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日本形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 曾世豪，〈華、夷再變：論《女仙外史》中的秩序觀想像〉，《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28期，2014年6月，頁195-222。
- _____，〈戲擬與感舊：論《水滸後傳》對《水滸傳》之再現模式〉，《東華漢學》第23期，2016年6月，頁135-168。
- 黃志繁，〈「賊」「民」之間：12-18世紀贛南地域社會〉，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
- 彭知輝，〈論《說唐全傳》的底本〉，《明清小說研究》1999年第3期，頁181-187。
- 程國賦、楊劍兵，〈呂熊及其《女仙外史》新論〉，《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頁136-142。
- 趙世瑜，〈《女仙外史》初探〉，《漢中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2期，頁102-116。
- 趙園，《想像與敘述》，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
-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 鄭潔西，〈16世紀末日本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戰爭與整個亞洲世界的聯動——以萬曆二十年明朝「借兵暹羅」征討日本議案為例〉，《海洋史研究》第3輯，2012年5月，頁124-140。
- 劉曉東，〈南明士人「日本乞師」敘事中的「倭寇」記憶〉，《歷史研究》2010年第5期，頁157-165。
- 劉瓊云，〈人、天、魔——《女仙外史》中的歷史缺憾與「她」界想像〉，《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8期，2011年3月，頁43-94。
- 駱水玉，〈《水滸後傳》——舊明遺民陳忱的海外乾坤〉，《漢學研究》第19卷第1期，2001年6月，頁219-248。
- 閻瑞雪，〈黃宗羲日本乞師事考：兼論南明士大夫對中日關係的看法〉，《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頁115-119。
- 顏美娟，〈一部值得注意的小說——《戚南塘平倭全傳》〉，收入'93中國古代小說國際研討會學術委員會編，《'93中國古代小說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開明出版社，1996年，頁264-283。
- 薩蘇，〈《說唐》裡的外語〉，《西西河》網站，網址：<https://www.cchere.com/article/2552848>，檢索日期：2017年4月5日。
- 〔日〕上田信著，高瑩瑩譯，《海與帝國：明清時代》，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
- 〔日〕木宮泰彥著，胡錫年譯，《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
- 〔日〕田中健夫著，楊翰球譯，隋玉林校，《倭寇——海上歷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年。
- 〔日〕石原道博，《日本乞師の研究》，東京：富山房，1945年。
- _____，〈朝鮮側よりみた明末の日本乞師について〉，《朝鮮學報》第4輯，奈良：朝鮮学会，1953年，頁117-129。
- 〔日〕辻善之助，〈德川家光の支那侵略の雄圖と國姓爺〉，《增訂海

- 外交通史話》，東京：內外書籍，1936年，頁640-659。
- 〔日〕增田涉著，由其民、周啟乾譯，《西學東漸與中國事情》，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
- 〔美〕ロナルド・トビ（Ronald P. Toby），〈「明末清初日本乞師」に関する立花文書〉，《日本歴史》498号，東京：吉川弘文館，1989年，頁94-100。
- 〔美〕浦安迪（Andrew H. Plaks）著，沈亨壽譯，《明代小說四大奇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局，2006年。
- 〔美〕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 Jr.）著，陳蘇鎮、薄小瑩等譯，《洪業——清朝開國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

Like Wu Sangui Opening the Gates to the Shanghai Pass: The Depiction of the Request for Military Assistance from Japan in Qing Dynasty Novels

Shih-Hao Tseng*

Abstract

The effect of the Ming-Qing Cataclysm was not only confined to the Chinese mainland, as its aftermath was also felt in Japan. Previous studies of the “Request for Military Assistance from Japan” have focused on clarifying historical source materials related to this event. However, the failure of the loyalists’ plan made them quite depressed, and the demise of the Ming dynasty could in fact be traced back to the anti-Yamato wars during the Jiajing 嘉靖 and Wanli 萬曆 periods. Several novelists combined these two issues in novels such as the *Shuihu houzhuan* 水滸後傳, the *Nüxian waishi* 女仙外史 and the *Shuo Tang yanyi quanzhuan* 說唐演義全傳. Contradicting historical fact, the authors portrayed the individuals asking for aid as villains, and moreover deprecated the Japanese as brutal marauders. This narrative approach not only echoed the memories that the people of time had of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South China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it further combined the barbarians of the north (*beilu* 北虜) with the Yamato of the south (*nanwo* 南倭). In the end, the Chinese army used snow and swords to defeat the invaders

* Ph.D.,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nd maintain the *Huayi* 華夷 order.

Key words: request for military assistance from Japan, the *Shuihu houzhuan* 水滸後傳, *Nüxian waishi* 女仙外史, *Shuo Tang yanyi quanzhuan* 說唐演義全傳, Japanese marauders